

第三卷

发展的世纪

[美] 唐纳德·F.拉赫 埃德温·J.范·克雷 著

第一册(下)

贸易 传教 文献

许玉军 译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

[美] 唐纳德·F.拉赫 埃德温·J.范·克雷 著

周宁 总校译



人民出版社

第三卷 发展的世纪

[美] 唐纳德·F.拉赫 埃德温·J.范·克雷 著

第一册(下) 贸易 传教 文献

许玉军 译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

A
SIA

[美] 唐纳德·F.拉赫 埃德温·J.范·克雷 著

周宁 总校译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E



人民出版社

k500.3
41
v3-1-2

2008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西方中国形象的变迁及其历史和思想根源研究”资助成果

“十二五”期间（2011—2015 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献给阿尔玛·拉赫和伊莱恩·范·克雷

目 录

(下)

第四章 意大利语文献	435
第一节 17 世纪中叶前的耶稣会士书简	436
第二节 新曙光和旧论战	445
第五章 法语文献	464
第一节 耶稣会士书简和东印度公司前时代的游记	465
第二节 巴黎外方传教会和法国东印度公司	480
第三节 暹罗和中国	490
第六章 荷兰语文献	519
第一节 到东印度群岛的早期游记：1597—1625 年	521
第二节 超越东印度群岛——1645 年前的探索活动	533
第三节 艾萨克·考梅林的《荷兰联合省东印度公司的创始和发展》	544
第四节 新视野和新空间，1646—1671 年	556



第五节 世纪末的衰落	573
第七章 德语和丹麦语文献	610
第一节 17 世纪中叶前的耶稣会士书简和报告	611
第二节 17 世纪中叶前的游记文集	614
第三节 有限的复兴, 1650—1700 年	623
第八章 英语文献	657
第一节 第一代, 1600—1626 年	659
第二节 喧嚣的世纪中期, 1630—1680 年	678
第三节 晚期的收获, 1689—1700 年	684
译名对照表	718
索引	785
后记	851



第四章 意大利语文献

17 世纪的曙光刚刚降临，西班牙在意大利的政治和军事根基都不稳定。西班牙虽然在北欧遭受了极大的挫败，但是到 17 世纪 40 年代之前在意大利并未受到公开的反击。即使到了这个时代，西班牙仍然能够抑制那不勒斯的反叛，确保自己的主导地位。该世纪中叶，西班牙国王在伊比利亚和北欧遭受的损失，迫使意大利的西班牙统治者加强控制权。同样道理，教廷逐渐失去了在北欧的地位和威望，从而加紧了在意大利的行动力，抑制异教和物欲主义势力的增长。同时，大约有十几个意大利人在亚洲耶稣会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赫。^[1]事实上，葡萄牙对其他国家的耶稣会士和教廷破坏保教权的行为一直耿耿于怀。一方面，伊比利亚总体上将意大利人排除在直接贸易之外；另一方面，他们却无法阻止对方涉足他们试图独霸的传教事业。

17 世纪前十年，多数进入意大利的亚洲资料都以耶稣会士书简集的形式出版。日本耶稣会的主要报告人伏若望（Luis Fróis）长久以来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报告，被加斯帕罗·斯皮泰利（Gasparo Spitali, 1561—1640 年）和弗朗西斯科·莫卡蒂（Francesco Mercati, 1541—1603 年）从葡萄牙语译成意大利语，前者是耶稣会档案保管员，也是总会长的秘书，后者是罗马耶稣会士。这些译



著通常首先在罗马出版，然后才在其他城市特别是米兰、博洛尼亚（Bologna）、帕多瓦（Padua）等地发行。例如，伏若望关于丰臣秀吉和“26名基督徒殉难”事件的报道，很快就从意大利语译成拉丁语和德语，在欧洲更为广泛地发行传播。^[2]早在1581年罗马开启的官方编纂和发行“年度书简”（Annual Letters）的惯例，断断续续地持续到1619年。^[3]

其他出版物包括来自官方发行的书简集摘录或者从多个书信中抽取内容合并出版。^[4]这些分散的非官方出版物是在威尼斯或者其他商业中心发行的，显然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印刷行甚至还发行了和荷兰海外事业相关的材料。^[5]特别是威尼斯人，他们相当关注香料贸易的进展情况。卡斯托·杜兰特（Castor Durante）所著的《新腊叶集》（*Herbario novo*）分别于1602年、1617年、1636年和1667年在威尼斯发行了不同的版本，^[6]而加西亚·达·奥尔塔（Garcia da Orta）关于印度药材的作品于1605年和1616年发行了两个版本。塞西诺·马丁内洛（Cechino Martinello）所写的关于马六甲的豆蔻属和菖蒲属植物的观察报告以单本小册子的形式于1604年在威尼斯出版。^[7]

第一节 17世纪中叶前的耶稣会士书简

17世纪前半叶，耶稣会士提供了大量有关东方的信息，印刷出版后进入意大利读者的视野。耶稣会1595年后重组了东方行政管理机构，限制了范礼安在中国和日本的权限。1596年，葡萄牙学者型耶稣会士尼古拉斯·皮门塔（Nicolas Pimenta, 1546—1613年）被派遣到果阿，以巡回使的身份管辖东印度群岛、果阿辖属省份、马拉巴尔地区，以及这些地方在印度东部的附属区。同时，意大利人巴范济（Francesco Pasio, 1551—1612年）实际上已经掌控了日本传教会，且不间断地写信向欧洲报告日本的情况。范礼安1606年和利玛窦1610年相继逝世后，巴范济被任命为中国和日本的巡回使。1612年，他在澳门逝世。在亚洲传教会中担任重要教职的意大利人发往罗马和耶稣会总会长的报告在欧洲广为流传。

巴范济首次发表的关于“东印度群岛”传教所的报道，于1601年在美因茨（Mainz）用拉丁语发行，罗马发行了卡洛·萨塞蒂（Carlo Sassetti）翻译的意大利语译本。皮门塔1599年12月写于果阿的《书信》（*Lettera*）内容包括来自印度东部、勃固和马六甲耶稣会传教所主管呈给他的报告。在罗马发行的那个版本次年在米兰和威尼斯重印，拉丁语原版很快被译成法语（安特卫普，1601年）。^[8]皮门塔撰写于1600年的第二份报告于1602年在罗马以意大利语出版。^[9]其内容包括有关传教所的其他报道以及皮门塔在北印度地区的游记。这封书信报告详细地评述了印度的环境，同时也涵盖了一些马鲁古群岛和中国事件的信息。皮门塔同时也报道了耶稣会士从柬埔寨的撤离，这有利于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在此立足和发展。^[10]1602年，第二篇报告的重印版在威尼斯发行；同时，它也被翻译成拉丁语（1602年）、德语（1602年）、葡萄牙语（1602年）和法语（1603年）。奥古斯丁会修士弗朗西斯科·佩雷拉（Francisco Pereira, 1585—1621年）所著的关于印度的报道1606年在罗马出版，后来出现了法语译本（巴黎，1606年；安特卫普，1607年）。^[11]从这些传教报告中，意大利可以及时地跟踪天主教在印度和东南亚获得的成功和遭遇的挫折，至少可以间接地了解传教士所工作的区域和环境。

意大利耶稣会士——范礼安、利玛窦、龙华民和巴范济——在中国和日本传教事业中特别活跃，地位也很重要。巴范济从1597年到1612年去世期间实际撰写的内容都和日本的基督教事业相关，他从1601年起就任日本教区副主教，到1611年担任这里的巡阅使一职。他写于1598年讲述丰臣秀吉死亡的书信报告被加斯帕罗·斯皮泰利从葡萄牙语翻译成意大利语，并于1601年在罗马出版。^[12]这部书简集很快就在威尼斯和布雷西亚（Brescia）出版了，篇幅有所删减。巴范济1601年写自长崎的年度书简，详细地描述了日本基督徒在丰臣秀吉逝世后的内乱中所遭遇的艰难处境，笔调十分阴郁。^[13]在罗马发行的这个版本于1604年又分别在威尼斯和米兰出版。^[14]由于巴范济1600年的年度报告在发往欧洲的路上遗失，瓦伦丁·卡瓦略（1559—1631年）又撰写了该报告的“补编”，并于1603年在罗马出版，同年，巴范济1601年的年度报告也在这里出版。^[15]这些出版作品与巡阅使范礼安写于1599年的书信结伴出版，后者也是



关于日本的政治局势变化。^[16]从这些报告中,读者可以明确地知道发生在日本的情况,先前繁荣昌盛的传教事业经历了1598年至1601年的危机之后,处境艰难。

日本的1603年年度书简由两封书信构成,分别由葡萄牙耶稣会士马泰奥·德·库罗斯(Mateo de Couros, 1568—1633年)和加布里埃尔·德·马托斯(Gabriel de Matos, 1572—1633年)撰写。马托斯的书信报告1605年首先在罗马出版,讲述了日本在德川家康的指挥下重返和平,传教事业再度复苏。^[17]三年后,库罗斯的年度报告出现在一部由3封书信组成的集子里,巴范济将其转交给耶稣会总会长。^[18]其他的书信报告由日本教区主教的秘书,即葡萄牙人若昂·罗德里格斯·吉朗(João Rodrigues Girão)撰写,叙述的是从1604年到1606年日本各传教所的客观情况。同时,日本耶稣会主教路易斯·德·谢奎拉(Luis de Cerqueira, 1552—1614年)1604年给罗马发了一封报告,讲述的是6名日本籍基督徒在庄严的传教所遭遇迫害的事件,三年后这封报告在罗马出版。^[19]1608年,威尼斯出版了一本合集,内容选自各个已经公开发行了的书信报告。^[20]

17世纪20年代首先在罗马出版了关于日本的1606年年度报告,这个年度报告显然是由传教会的代理人兼“译员”的陆若汉(1561?—1633年)撰写。^[21]同时,耶稣会主教从日本发回一封记述报告,事关9名基督徒在肥后(Higo)殉道。^[22]直到1615年该作品才在意大利出版,有关日本的内容稍有增加,这一年支仓传教会成立(1615年10月,持续到1616年1月)。然后,耶稣会出版了罗德里格斯·吉朗撰写的1609—1610年年度报告,其中涉及荷兰严重威胁到从澳门到长崎的海上航线。^[23]和使团直接相关的作品是1615年发行的斯皮翁·阿玛蒂(Scippione Amati)著的《日本幕府统治的历史》(*Historia del regno di Voxu del Giappone*)。这本包括31个章节内容的小册子详细地介绍了奥州市的大小及其统治家族,讲述了方济各会修士路易斯·索特洛的成绩,描绘了使团从日本到罗马的行程,再现了谈判代表带来的文件以及在接待宴会上所做的演讲。^[24]这次阵容庞大的访问之后,日本对基督徒的迫害成为当时的主旋律;1615年后,罗马出版的书信报告主要阐述的是对基督徒的考验和迫害。

日本使节在罗马接受宴请之际，金尼阁（1577—1628年）也在这里参加耶稣会从1615年11月5日到1616年1月26日举行的大会。^[25]金尼阁曾在中国工作过近两年，1614年返回欧洲后发起了一场号召为中国传教事业献身的运动。他和其他耶稣会士在罗马痛斥方济各会资助的日本传教会，因为这会游离人们关注耶稣会推行的宣传活动的视线。1610年，龙华民（1559—1654年）继利玛窦之后担任中国教区副主管，他派遣金尼阁返回欧洲争取中国教区从日本教省独立出来，招人马、募资金，从欧洲搜集一些书籍和珍贵礼品。金尼阁带回欧洲的行李袋中包括1610—1611年的中国《年度书简》（*Annuae*）、简编的1609—1612年的日本《年度书简》，以及利玛窦的评论。

17世纪前十年里，利玛窦在北京的宫城里成立了耶稣传教会。然而，那个时候在欧洲出版的多数有关中国的传教报告和书简集都不是出自他的笔端。1597年，西西里岛耶稣会士龙华民刚一到达中国就被派往韶州。次年，他发往欧洲一封书信，该信于1601年在曼图亚（Mantua）出版。^[26]在这封长达32页的书信中，龙华民讲述了他在广东北部那块于他绝对陌生土地上的传教经历，以及与佛教徒的争吵和辩论。澳门耶稣会神学院院长瓦伦丁·卡瓦略将1601年的年度报告发往欧洲，这封报告1603年在罗马出版。内容关涉学院事务以及耶稣会在中国内陆的活动。^[27]有关神学院和中国住所的详细报告由葡萄牙籍神父迭戈·安东尼斯（Diogo Antunes, 1552—1611年）在澳门撰写，供印度教省主教参考。^[28]

371

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发自北京的著名的1602年年度书简，讲述了耶稣会士到达北京的故事，该报告1607年在罗马出版。^[29]三年后，利玛窦关于中国的1606—1607年年度书简面世。在这个报告里，利玛窦描绘了中国传教所和日本传教所的环境状况以及鄂本笃的离世。其中还包括葡萄牙耶稣会士费奇规（1571—1649年）写自北京的一封信，他1604年携带普兰汀印刷出版的多种语言圣经来到中国朝廷。^[30]1614年金尼阁到达欧洲后，便着手把来自中国的1610—1611年的年度书简汇编成一大卷合集出版。^[31]这些书信报告是利玛窦逝世后在龙华民的指令下撰写的，其强调的重点包括：将北京作为传教士在中国工作的中心，必须尊重中国人熟悉的与外国人的相处方式，比较了中国的稳定



和平与日本的喧嚣动乱，以及希望中国成为耶稣会的一个独立教省并且派遣更多的传教士前来收获灵魂。^[32]

17 世纪的早期，有关马鲁古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意大利语资料零星可见，较少印刷发行。^[33]只有在佩德罗·奇里诺（Pedro Chirino）1604 年访问罗马并在此出版了他的西班牙语报告之后，菲律宾才引起大家的注意。^[34]次年，胡安·德·里贝拉（Juan de Ribera）撰写的关于菲律宾的 1602—1603 年年度书简的意大利语版本在罗马面世。这个报告全面概述了传教所的情况，强调了菲律宾作为在中国、日本和马鲁古群岛传教的跳板的重要性。^[35]1608 年的年度书简于 1611 年在罗马出版。其作者教区长格雷戈里奥·洛佩斯（Gregorio López）评述了传教前哨的环境条件，特别指出了基督徒在米沙鄢群岛和棉兰老岛与穆斯林的冲突。^[36]

1615 年，耶稣会士在果阿和科钦教省临近地区的活动报告在罗马出现，这同时引起人们关注南亚和马鲁古群岛传教会。^[37]其中包括由热罗姆·沙勿略 1611 年写自拉合尔的 3 封信，内容关涉莫卧儿帝国。他评论道，苏丹王萨利姆（Salim，也叫贾汗吉尔）非常亲近传教士，在波斯的使徒历史上他比别人更喜欢基督徒送给他的礼物。即使是面对其他政府成员敌视基督徒但却示好穆斯林的不利情况，使徒们仍希望能够皈依这位苏丹王。沙勿略讲述了萨利姆决定派遣使节前往阿格拉和果阿，以及耶稣会士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极尽渲染了萨利姆家庭成员受洗和皈依仪式的盛况。这个合集也包含了 1612 年的传教报告，内容有马杜赖的传教情况，以及罗伯特·德·诺比利的语言研习、和婆罗门的争论、主动融入印度的思想和风俗习惯等活动。^[38]在这同一封信里，也评价了耶稣会士在圣多默基督徒中的活动。涉及马鲁古群岛的部分，强调了荷兰人和英国人在海岛东南亚严重扰乱了传教士的生活。

在 1615 年日本使节还没有到达罗马之前，日本的耶稣会士就写信痛斥大规模恢复对基督徒的迫害、对传教所设施的破坏、一些传教士逃离到澳门、交趾支那和菲律宾避难等情况。1617 年，罗马分别出版了 1613 年和 1614 年的日本传教报告。塞巴斯蒂昂·维埃拉（Sebastião Vieira, 1574—1634 年）写自长崎的 1613 年年度书简，详细地评论了日本殉道者的英雄气概，推举他们为欧洲人的

先驱榜样。加布里埃尔·德·马托斯所著的1614年年度报告更长，详细地罗列了各个传教所蒙受的损失，结尾处号召人们为日本祈祷。^[39]1617年发表的这两部作品似乎是已经出版了的专门针对日本事件的最后一部书简集。此后，关于日本的多数官方耶稣会士出版物仅限于年度书简精选，或者是单独成册的关于基督徒殉难的启示性报告。

关于日本的1615—1616年年度报告是由达尔马提亚人(Dalmatian)耶稣会士乔万尼·弗雷曼斯(Giovanni Vremans, 1583—1620年)在澳门撰写的，于1621年首次在那不勒斯以合集的形式出版。^[40]这封报告很长，详细报道了日本的政治和军事摩擦、基督教的宏观情况和耶稣会的具体状况，以及全国范围内各个传教所的基督徒殉道事件等。^[41]紧随其后的是葡萄牙耶稣会士加斯帕尔·路易斯(Gaspar Luis, 1586—1648年)1619年写自果阿的一封信，关注的重点是印度西海岸的瘟疫、台风和地震造成的损失。^[42]这个那不勒斯出版合集中的其他书信，讲述了向莫卧儿帝王的布道、交趾支那教会的建制，以及满族人进军北京等。总而言之，这是1615年至1619年间关于东方各种事件信息量极为丰富的一部合集。^[43]

1624年，耶稣会士将1619年至1621年的传教报告分成两册在罗马出版，内容分别选自日本和中国的传教报告。在日本卷里，当然包括大家所预测的关于迫害基督徒及其殉道的内容。^[44]第四封传教报告来自虾夷(Yezo)地区的松前岛(Matsumae)，作者是西西里岛耶稣会士吉罗拉莫·德·安杰利斯(Girolamo de Angelis, 1567—1623年)。1618年，德·安杰利斯和其他耶稣会士来到虾夷，看护来这里逃避迫害的日本籍信徒。德·安杰利斯在他的传教报告中还附带了一幅虾夷岛的小地图。^[45]

中国卷包括1619年、1620年和1621年三年的年度书简。^[46]第一封信是由阳马诺(Manuel Dias, 1559—1639年)写自澳门，报告了明朝在辽东地区受到的袭击、汉族人已经意识到其中蕴藏的灾难，以及北方的耶稣会士避开满族人的进攻等。^[47]第二封信是由波希米亚耶稣会士祁维材(Wenceslaus Pantaleon Kirwitzer, 1588—1626年)写自澳门，讲述了金尼阁1620年返回东方以及他新招募到澳门的传教士、满族人的进一步进攻，以及汉族人和朝鲜人因此遭受



374 的重大损失。^[48]第三封信由金尼阁写自南京北部地区，描述了1620年万历皇帝的驾崩、军事挫败和北方前沿遭受损失之后的继发危机，以及耶稣会计划到朝鲜传教等。^[49]

1627年，有3部重要的耶稣会出版物在罗马面世。专门针对亚洲西半部传教会的合集包含几封相关的传教报告。^[50]1620年，果阿教省大主教那不勒斯人杰罗尼莫·马约里卡（Gironimo Maiorica，1589—1656年）报道了下面各地耶稣会神学院的情况：果阿、朱尔、塔纳（Tana）、勃生、达曼、第乌、阿格拉、撒尔塞特岛。次年，他又写了一封类似但更为精炼的报告，其中他关注了用印度西部的卡纳拉语印刷出版的马可·吉奥基奥（Marco Giorgio）教义。1621年，马六甲本土人吉亚辛多·佩雷拉（Giacinto Perreira，1598—1627年）在科钦报道了马拉巴尔、孟加拉、锡兰和马六甲的环境。若昂·达·席尔瓦（João da Silva，1597—1624年）在其去世的前一年即1623年在果阿写到该城市恼人的气候。安多德（Antonio de Andrade）简单地提到了他1624年首次到西藏传教的经历，这些内容也被收编在合集中。塞巴斯蒂昂·巴雷托（Sebastião Barreto，1567—1625年）的1624年年度报告概括了和阿格拉相关的事件，包括安多德经由克什米尔进入西藏的故事。^[51]安多德返回阿格拉之后写了一部更加全面的关于进入西藏传教的报道，后来这个报告被从葡萄牙语译成意大利语并在罗马出版，时间也是1627年。^[52]

1621年和1622年关于中国和日本的年度书简也被收在一个合集里于1627年在罗马出版。^[53]前两封信分别由耶稣会士彼得·保罗·纳瓦罗（Pietro Paolo Navarro）和杰罗尼莫·马约里卡写自日本和澳门，详细地讲述了日本基督教群体遭遇的可怕的殉道事件；对其他事情或者只字不提，或者简略提及。澳门的传教报告也是一个摘要性的概述，资料或者来自难民，或者来自囚徒，或者来自潜逃者。^[54]1621年关于中国的报告由金尼阁在杭州执笔撰写，主要内容是满族人在中国北方的推进：辽东陷落、北京的恐慌、全国各地抗议年轻的明朝皇帝。^[55]其后是一封曾德昭在江西首府南昌写的传教报告，内容相似。1623年，他还在这里报告了约300万人死于战争，恐慌感蔓延整个国家。^[56]

安多德1626年在西藏的探险活动是《年度书简》（*Lettere annue*）这部



1628年在罗马出版的著作中的主导话题。^[57]安多德把第二次探险经历描述的稍微简略,只是描绘了西藏的地貌和政治分裂状态。他谈到了喇嘛教(Lamaistic religion)以及学习藏语的必要性。他断言道,契丹不是一个帝国,而是一座大城市,一个省的首府,非常靠近中国。^[58]这本书里两封信当中的第二封是祁维材在澳门撰写的关于中国1624年的传教报告。信中除了报告耶稣会士取得的进展外,还涉及明朝年轻统治者的懦弱,因为这位年轻人无意从满族人手里收复辽东,明朝统治这里三百多年的历史中没有诞生一个文人学者。^[59]

若昂·罗德里格斯·吉朗流放澳门期间,于1625年撰写了关于日本的1624年年度书简。1628年,这个报告单独成册在罗马出版,内容150页。他评述了日本耶稣会士1624年及其之前多年所经受的考验和苦难。^[60]这部作品很快就不在那不勒斯、米兰、博洛尼亚再版,并被译成拉丁语(美因茨和迪林根[Dillingen])、法语、佛兰芒语和德语。在美因茨出版的拉丁语版本的标题为《1624年的日本》(*Historia Japonensis anni MDCXXIV*)。

来自中国的通讯简报和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报告一道于1629年在罗马出版,宣称在印度支那“发现”了东京(越南)。^[61]1626年早期,来自托斯卡纳的耶稣会士朱里安诺·巴尔迪诺蒂(Giuliano Baldinotti, 1591—1631年)在一位日本信徒的陪伴下从澳门来到东京(越南),商讨如何将这里纳入传教规划中。红河三角洲的城市很早之前就被葡萄牙人“发现”了;巴尔迪诺蒂来到这里登上葡萄牙的一艘商船。然而,对整个欧洲而言,巴尔迪诺蒂从澳门发出的侦察报告(1626年11月12日)因其对东京实地考察的价值而被印刷出版。^[62]该合集中来自中国的另一封书信出自小阳马诺(1574—1659年)之手;这封来自上海嘉定的信件描述了1625年中国中部的情况。^[63]

376

随着中国和日本的传教环境越来越混乱和危险,耶稣会和其他传教团体开始关注东南亚。^[64]1631年,为教皇乌尔班八世(1623—1644年在位)服务的安特卫普人大卫·哈伊科斯(David Haex, 约1595年出生)在罗马出版了一部马来语—拉丁语词典,这部词典起初是在德那地起草的。^[65]这部长达75页的词典旨在将传教士吸引到东南亚商业发达的马来西亚,由传信部主持出版,也是为了献给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巴贝里尼(Francesco Cardinal Barberini)。



巴尔迪诺蒂突袭进入东京（越南）之后，耶稣会士 1631 年在罗马出版了克里斯托弗·波利（Cristoforo Borri）关于交趾支那的记述，信息丰富，内容庞杂。^[66]波利是一名来自米兰的天文学家，在交趾支那生活了四年，他掌握的当地语言足以听懂信徒的忏悔。他的作品素材源自 1617 年到 1622 年在交趾支那的亲身经历和耶稣会士的书简，作品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国家整体情况；第二部分是关于传教情况。作为一部出自传教士之手的记述，它的内容比较全面，包括物产、贸易、农业、动物、风俗等。其内容是奠基性的，17 世纪出了 5 个译本，18 世纪再版了 4 次，19 世纪再版了 1 次，20 世纪至少再版了两次。^[67]

1632 年至 1641 年的十年间，在意大利出版的书籍都和日本基督徒的殉难相关。这段时间，日本的国门紧锁，彻底向天主教传教士及伊比利亚传教士关闭。同时，这也是一段战争不断的时间，北欧反抗西班牙，那不勒斯和葡萄牙抗议西班牙国王的声浪此起彼伏，甚嚣尘上。中国的明朝统治者黔驴技穷、日暮途穷，这里的耶稣会士和其他传教士对基督教事业的前途越来越绝望。在菲律宾、香料群岛和印度尼西亚等地，人们警觉地观察着荷兰和英国的不断推进，充满了恐惧和不安，整个西班牙帝国都流传着这样的声音：即将从亚洲舞台退出。事实上，约 1640 年左右，整个亚洲的天主教事业都遭遇了类似于日本基督徒那样的殉道困境。

1632 年，罗马出版了一部书简，详细地阐述了 1625—1627 年间日本本土和外来的基督徒所遭受的苦难。^[68]同时出版的还有迭戈·阿杜阿尔特著作的意大利语译本，他报道的 1626—1628 年基督徒受迫害的西班牙语作品 1629 年在马尼拉出版。^[69]紧随着两部出版作品之后的是克里斯多弗·费雷拉（Christovão Ferreira, 1580—约 1652 年）1635 年所著的书简，讲述的是 1628—1630 年间日本基督徒遭遇的迫害。^[70]1636 年，译员陆若汉所著的 1632—1633 年在日本殉难的耶稣会士名录的意大利语译本出版。^[71]为了纪念沙勿略到达日本一百周年，那不勒斯 1641 年出版了贝纳迪诺·金纳罗（Bernadino Ginnaro, 1577—1644 年）的《东方沙勿略》（*Saverio orientale*）。^[72]这部内容分为 4 部分的宏大编著选材广泛，主要来自耶稣会士书简和其他作品，关注的中心是日本及这

里的基督教事业。第一部分长约 300 页,描绘了日本的地理和自然史,以及本土宗教、历史和统治阶级。这一部分还附有一幅新地图(第 26 页),作者不详,这成了 17 世纪欧洲出版的日本地图的原型。^[73]

其中使用过金纳罗地图的人之一是嘉尔定(Antonio Francesco Cardim, 1596—1659 年),这位葡萄牙耶稣会士约 1640 年从东亚返回罗马充任日本教省的代表。1645 年,他在罗马出版了关于日本的《日本教省报告》(*Relatione*)^①,详细地介绍了以下各地的传教情况:澳门、东京(越南)、交趾支那、海南、柬埔寨、暹罗,以及他 1623—1638 年间工作过的耶稣会日本教省的其他辖区。^[74]1646 年,他在罗马用拉丁语出版了一本书,其中含有 85 位欧洲传教士或者日本当地基督徒的生平传记,他们都曾继沙勿略之后在日本传教会担任过领导。^[75]第 12 页有一幅地图,与金纳罗 1641 年版的地图相似但不完全相同。^[76]同时,他 1646 年还在罗马出版了一部原著为葡萄牙语的拉丁语译本,原著曾于 1643 年在里斯本出版,描述的是 4 名葡萄牙使者 1640 年在长崎遭遇迫害的故事。^[77]嘉尔定在罗马一直逗留到 1655 年;后来又返回澳门,四年后在这里辞世。

378

第二节 新曙光和旧论战

正当传教士们纠结于失去一块绝好的传教圣地之时,一些意大利城市——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却试图直接参与香料贸易。17 世纪初,托斯卡纳大公费迪南多·德·美第奇(Ferdinando de' Medici, 1587—1609 年在位)希望在里窝那(Livorno)建立一个国际港口,专门从事与东方的贸易。1606 年当弗朗西斯科·卡莱蒂(Francesco Carletti, 约 1573—1636 年)结束环球航行返回佛罗伦萨时,这位大公就东方的见闻详细地咨询了他。^[78]1623 年,一些热那亚商人与波斯人和亚美尼亚人联手上书热那亚上议院,请求授权成立东印度

① 标题为: *Relatione della provincia del Giappone...*——译者注